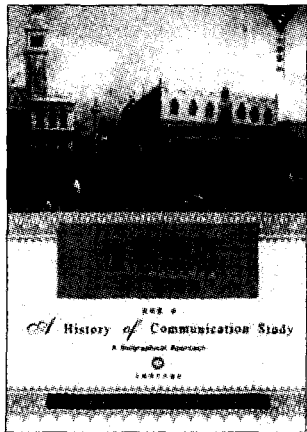


# 传播学的视野

读 W·L·罗杰斯《传播学史》札记



□ 芮必峰

20 多年前接触传播学至今,心里始终有个疑问:传播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问?一方面,老师和教科书告诉我们,传播学是一门经验的、定量的、侧重于效果研究的学问;另一方面,常识告诉我,这样的研究对于人类社会的传播现象和传播行为只能是表层的、浮浅的甚至片面的。因为人不仅依赖经验,更超越经验;社会关系不仅是简单的“量化”关系,更是复杂的“质化”关系;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传播,许多情况下是没有目的(起码没有明确目的)、不计效果(起码不计那种直接的、显在的、即刻的效果)的文化行为。于是,我对传播学开始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敬”是由于它与我们的联系是如此的密切,就像水之于鱼、阳光之于植物。杜威就说过:“社会不仅是由于传递、由于传播而得以存在,而且完全可以说是传递、传播之中存在着。”施拉姆本人也说:“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sup>①</sup>(施拉姆,1973)“远”是由于“正宗”的传播学从内容到方法似乎已经划定了自己的疆域,使得像我这种缺乏“科学”思维的人不敢也不想接近。

传播学究竟是一门怎样的学问?这个问题恐怕一时难以形成共识。让我们把问题置换一下:传播学何以成为现在这样一门学问?

无论人类社会有多么源远流长的传播思想,也无论先前有多少学者围绕人类传播作出多少杰出的研究,传播学的创建者都应该非威尔伯·施拉姆莫属。罗杰斯在谈到施拉姆对传播学的贡献时说:“威尔伯·施拉姆是传播学的奠基人。如果他对于这个领域的贡献能够以某种方式取消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传播学这样一个领域了。”施拉姆是政治学学士、美国文明硕士、英国文学博士。这样一个学历背景的人创建传播学似乎纯属偶然。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华盛顿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的工作经历,他可能成为一名文学教授或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传播学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它从欧洲为美国带来了K·勒温、P·F·拉扎斯菲尔德、T·阿多诺等流亡学者;它吸引了像C·I·霍夫兰和H·D·拉斯韦尔那样的美国学者从事传播学研究;它还把那些将要开创传播学领域的学者连接成一个密集的网络。”除了战争的机缘外,还有战时的需要成就了传播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联邦政府涉及几

种类型的传播研究，其中的每一种都对传播学领域产生了重要的、长时间的影响。在美国陆军中，霍夫兰等人从事军事训练影片的评价工作，由此，说服研究的传播得以发展起来。在国会图书馆中，拉斯韦尔对同盟国和轴心国的宣传信息进行了内容分析。在坎布里奇的麻省理工学院，诺伯特·维纳教授就如何改进防空袭火力的准确性的数学问题——它由五角大楼资助——撰写他的“黄色险境”报告。这项工作导致了控制论，后来涉及通过反馈来对自身进行调节的系统。在纽约的贝尔实验室，克劳德·F·香农开展密码分析，这构成信息论的基础。在统计局，施拉姆帮助罗斯福总统起草对全国的广播讲话，包括罗斯福著名的“炉边谈话”。可见，上世纪40年代美国对传播较为集中的研究并无学科发展的必然性，而传播学侧重于效果研究的传统，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战时的需要。施拉姆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回到依阿华大学并创立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在高校或研究机构把规划小组在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中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延续下去？他坦言自己非常想做这样的事情。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理解，施拉姆为何一方面在他的《传播学概论》中大段引用C·H·库利（一个被美国正统社会学界嘲讽为“坐在安乐椅上的社会学家”）关于传播的定义，另一方面又将拉斯韦尔等四人尊为传播学的奠基人。

从传播学引入国内至今，它与新闻学之间的关系一直成为讨论或争论的话题。事实上，传播学与新闻学结缘多少也是有些“阴差阳错”。1935~1942年，施拉姆是依阿华大学英语系教写作的助理教授，在统计局和战时新闻局工作了15个月，他再次回到依阿华大学。“从逻辑上说，施拉姆本该更适合于回到依阿华的写作班”，那样的话，传播学就可能出自文学院或其中的英语系。由于想留下施拉姆，校方还向他提供了一些可供选择的行政位置，包括图书馆长，“如果他接受了那个位置，传播学就有可能出自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了”。施拉姆最终却成为依阿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罗杰斯对此评论说：“让施拉姆任新闻学院院长，这多少是个奇特的选择，因为他从未做过专职记者。当时，诸如记者或编辑的经历被认为是聘任新闻教授的一个基本要求。施拉姆实质上不是一个新闻学教授，在他一生中的任何时候，他也没有教过写作和编辑技巧方面的课程。”要说传播学的渊源学科，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还有信息科学都可以算得上，但新闻学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早期涉足传播领域的，大多是上述学科背景的学

者，而新闻学背景的学者则寥寥无几。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之所以成为问题，多半缘于当年依阿华大学“奇特的选择”。这种“奇特的选择”还带来一个奇特的现象，即传播学被一分为二，大众传播在新闻学院，人际传播则被设在语言或戏剧艺术系。“在同一所大学校园内由两个不同的学院单位授予传播方面的博士学位，这种潜在的分裂状况今天在许多大学校园里得到复制。”此外，20世纪60年代美国大学出现的“绿眼罩人”与“卡方人”之争——三十多年后这一争论在我国重演——也与上述“特殊的选择”有关。罗杰斯为我们提供的这些史实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传播学与新闻学并无必然的联系，既非新闻学孕育传播学，也非传播学孕育新闻学；新闻学自然无法包容传播学，传播学恐怕也无法取代新闻学。传播学与新闻学联系的密切程度并不超过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甚至语言学、符号学、文化学、信息科学等等。果真如此，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也许只有目录学上的意义，舍此，恐怕就只能解释为两个本无必然联系的学科在同一教学和研究单位的“势力”之争、“权力”之争，或换一种好听的说法，叫“合法性”之争。第二，传播学本不该被“囚禁”在新闻学院，因为它是综合学科的产物，有着比新闻学更广阔的学科背景，是60多年前依阿华大学那个“奇特的选择”造成了现在的状况，它促成了传播学的诞生，同时又限制了传播学的发展。传播学应该有比现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

传播学的经验论立场和定量研究方法则是根源于当时的文化和学术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让人肃然起敬的伟大成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自然科学能够为最终解决困扰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如果达尔文的学说揭示了真理：人只是生物进化的一个结果，最多只是生物进化链中的一个高级环节，那么，适用于研究自然界的科学方法毫无疑问也适用于研究人类社会。在美国社会学发展史上，芝加哥学派的衰落与这种文化背景不无关系。“20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科学则随着对芝加哥学派的方法的背离而成为高度定量的和统计的。社会科学的主要模式是自然科学，后者已被完好地建立起来，并且受到极大的尊敬，所以这种对于自然科学的模仿使得社会科学趋于经验主义和量化的方法。”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他们对传播的研究的，传播学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包括传播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同时,就有人对此抱有怀疑甚至表示出反对态度。当阿多诺应邀参加拉扎斯菲尔德的“广播研究项目”时,他被该项目“类似于工厂一样的气氛”所震惊,阿多诺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我对业已进行的研究的第一印象是:完全没有任何详尽理解的痕迹……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和同事们交谈,听到诸如‘喜欢和不喜欢的研究’和‘某个节目的成功或失败’之类的话语,对于这些说法,我一开始几乎就听不懂……”对于这样一种高度应用性的研究,阿多诺非常藐视,认为它不仅缺乏学术研究的性质,而且其研究方法也成问题。因为“学术研究的进行应该推进知识的新领域,而不是为了使富有的媒体巨头能够变得更加富有”;就研究方法而论,“认为在刺激物中发现的社会含义与体现在‘反应’中的社会含义之间理所当然地存在一致性,这是天真的做法”。(阿多诺,1969)

事实上,行政研究和批判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经验论”研究与“唯理论”研究之间的矛盾一直贯穿于传播学发展中,只是在各种历史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前者压倒后者成为主流、中心进而形成传统。从这一意义上看,罗杰斯的《传播学史》是在向传统挑战。正如该书的中译者殷晓蓉所指出的:“欧洲起源、三个学派、四个先驱者和作为集大成者的施拉姆,是《传播学史》的主线”。将传播学置于如此广泛、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并详尽论述法兰克福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帕洛阿尔托学派开创性的作用,罗杰斯是在“提倡从一种更加宽泛的角度出发,来探讨传播学的发展历程及其所涵盖的问题域。他认为,上述三个学派的理论意义就在于:提供了有关传播在社会中的位置的更加统一的观点,因此,为现代社会所关注的许多新的研究领域都可以从中发现其最初形式”。(殷晓蓉,2001)

与其把传播学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不如把它当作在一个特殊的背景下,为了一些特殊的需要,一群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搭建的一座学术平台。我常常觉得奇怪:学术要求创新,而作为学术栖居地的高等学府在发展学术上则为何显得有些保守?一门新兴学科要为高校,尤其是有悠久学术传统的高校认可和接纳往往是困难的;一门得到认可和接纳的学科又往往被严格限定在既定的学术笼子里。学科的划分不是学术的目的,学术的目的是研究问题。20世纪上半叶,美

国社会科学(可能也包括自然科学)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问题”意识的觉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研究各种问题,一批社会科学家聚集到波托马克河沿岸,这里成了一块令他们兴奋的土地:“在大学里被学术分隔弄得困难的东西,在战时华盛顿则变成容易的事情。个体学问让位于团队研究,学科间的孤立让位于跨学科的合作。有几年我们从被称为‘学科’的东西中解放出来,我们不再限制自己,而是研究问题。”(尤劳,1968)传播学的产生是这种“学科解放”的结果,传播学的发展难道需要丢弃“解放”的传统为代价?

“我们是传播的动物,传播渗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它是形成人类关系的材料。它是流经人类全部历史的水流。”(施拉姆,1973)看来传播学的疆域还有待开辟,传播学的视野还有待拓展。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把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视为一种有用的分析方法,并认为它们的疆界是接壤的,兴趣是基本相同的。但“从长远看,两者都应该被囊括在第三个容量很大的学科内,它简单地叫交流。”(霍克斯,1977)从目前情况看,传播学还无法成为像结构主义和符号学那样的分析方法,但作为一个学术平台、一种学术视野则未尝不可。如果有更多的传播学者采用这一学术视野,来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种现象,或许能看到别样的景象,获得意外的收获;如果有更多其他学科的学者站到这个平台上来,或许能大大改变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使传播学得到新的发展。

最后,请让我抄录罗杰斯《传播学史》一书的最后一段文字,来结束这篇读书札记吧:“在一个更加遥远的未来时代,或许从现在开始几十年以后,施拉姆期望传播学将消失,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吸收到行为科学的一个重要统一体之中,这些行为科学最低限度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和经济学(这些学科在1900年左右就获得了它们目前的形式),它们的研究中心是人类行为。施拉姆期望,传播学会导致这一趋向行为科学统一体的运动。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传播学的分化,以及其他行为科学的分化是否让位于施拉姆所预言的那个统一体。”(罗杰斯,1994)■

(作者系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注释:

①本文引文均出自(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